

憲老與誠忠論

渤海新华书店印行

一九四八年四月

目錄

論忠誠與老實	一
論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	八
論對缺點的不調和性及布爾什維克的嚴肅性	一六
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上培養幹部	二四
對新鮮事物的感覺是布爾什維克的高貴品質	三六
與羣衆聯系是黨的領導者最重要的品質	四四
組織羣衆監督反對官僚主義	五二
領導者的工作方法——效率與遠見	五六
黨的建設問題	六五
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七五
論經濟工作者在工作中的黨性	八〇

論忠誠與老實

斯列波夫作
齊生譯

忠誠、老實——這是列寧、斯大林型的工作人員之確定不移的特點。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黨的與蘇維埃的幹部，要像列寧那樣忠誠與老實。布爾什維克在其工作與生活中的每一舉措，均需培植與發展這種優良的品質。

要忠誠——這就是說「要像伊里奇經常作的那樣，像每一個布爾什維克都應該作的那樣，將全部真情率直而老實地向黨坦白出來。」（斯大林）

黨對每個布爾什維克所要求的忠誠與老實，是在實際工作中來甄別檢驗的。一個共產黨員，不論其所處何種職位，他都應該有勇氣批判地估價自己的活動，說出自己活動的真情。在政治上的忠實，完全要由「言行一致」（列寧）來檢驗。由此就產生了一個最重要的布爾什維克的原則——不是按照人們的言詞、諾言、報告來評判人，而是按照人們的行為來評判人。

布爾什維克的話——是固定不移的話。領導者公務人員是不能隨便說話的，話既說出，那就要表現決心毅力，並執行自己的諾言。如果因為什麼原因，盤算錯

了，力不能勝，——那你就老老實實說出這一點，否則你就是以嘵舌者和騙子的可恥角色來說話。

列寧說，當一個人「言行不一致時，這就完全糟了，這會導向偽善。」

自然，當說到以忠誠的精神來教育幹部的時候，這就不僅是指這個字在普通意義上的忠實，而且也是指善於在每一件（即令是最小的）事情上，從整個國家的利益，從黨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地方的尤其不是從純粹私人的利益出發。

布爾什維克黨——蘇維埃人民的先鋒隊，蘇維埃人民偉大創造性的勞動之領導者——是以國家的全民的利益之深刻意識的精神，來教育全體勞動者的，這尤其指的是負責領導的幹部。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與實際證明，我們的幹部，是如何深刻地了解整個國家的利益，他們如何不可調和地對待各種反國家利益的現象。這在蘇維埃羣衆完成着的成千愛國事件的例子上就可以看出。

同時也有這樣的情形：有時某些工作人員將國家的利益置於腦後，爲了取得獎賞或隱瞞缺點，這樣的工作人員就粉飾真情實況，走上了哄騙國家、欺詐和捏造的邪路，而故意地提出不合實情的關於執行國家計劃的報告。

由伊凡諾夫負責的某建設局的領導者們，在好幾年中提出的關於建設情形的報告，都是假的。按照這些報告，有一百三十件計劃『卓越地』和『很好的』建設好了，其實其中六十五件是不完全的和不適於經營的。爲了這些誇張的數字，建設局

在兩年過程中，得到了兩百萬盧布的獎金，其中伊凡諾夫個人就得了十萬零三千盧布。奧木斯克州黨委會和中央建設局的領導者們，沒有即時注意這些欺詐和捏造，而是很久以後才把它揭露出來。

雖然類似的情況為數不多，黨的組織仍不能夠無視這些情況。事業的利益和幹部的教育，要求黨的組織不能無視任何一件非法的事，而是有責任給他們以反擊，以忠誠的老實的對待國家利益的態度來教育工作人員。

無須證明，及時揭露的缺點，是較易消除的。當人們不及時的講出真情，隱藏缺點，而最後使工作中的失敗暴露出來的時候，——那時要糾正形勢就非常困難了。由此可見工作人員是應該有勇氣講出真情，不粉飾現實，指出事情的實際狀況，及時地揭露缺點，並指出其根源。黨的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不應該將地方的利益提得過高，而應該如實地反映本區的企業、集體農場的情況。我們每個工作人員的本分，不要將被曲解了的個性威信高於一切。

對國家的不老實，常常表現在不願意肩負緊張的，但是完全可能完成的計劃，表現在企圖以各種藉口逃避計劃的執行，表現在極力想得到其實沒有也可以的國家的補充資材。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領導者，無須外界之督促，也無須訴苦，就盡力超過完成國家所給予的任務去尋求新的儲藏，俾使其燃於總的國家洪爐中，一心為國家的、人民的利益服務。

來自上級的最詳細的計劃及正確的指示，是不能夠預先估計到當地所有的全部可能性的。如果在工作的過程中發現了新的儲藏，布爾什維克不能也不應該將它們隱藏起來。他對誰隱藏他們呢？對自己的政府嗎？對自己的黨嗎？隱藏儲藏只能是這樣一些人的事：這些人將其衙門的鐘樓看得高過國家的、黨的利益。

這些允許自己對國家要狡猾的人們，是容易屈服於落後的傾向的。他們對橫在我們路上的困難，時刻準備加以誇大，又常常沒有表現勇氣與決心的魄力，希望不負責，把自己的責任推給別人——這是對完成國家義務的不老實態度的表現之一。害怕負責並按照『可不要出了什麼岔子』的原則去作事的膽怯鬼，是沒有能力將事情推向前进改善它，並表現創造性與主動性的。

以忠誠與老實的精神教育幹部，這就是要以工作人員自己的錯誤與缺點來教育他們。這是斯大林對布爾什維克幹部教育的珍言之一。

斯大林教導說：

『布爾什維克的責任就是：不掩蓋自己的錯誤，不逃避有關自己錯誤的問題（像我們常常發生的那樣），而是老實而公開的承認自己的錯誤，老實而公開地謀求糾正這些錯誤的方法，老實而公開地糾正自己的錯誤。』

有這樣的事實：某些工作人員逃避承認自己的錯誤，以為承認錯誤有傷工作人員的名譽，會有損其威信。這是對威信的不正確而虛偽的了解，實際上承認自己的

錯誤，準備糾正錯誤，是不會損傷工作人員的威信，反而會提高其威信的。必須記住列寧的金玉之言：聰明的不是那些不犯錯誤的人，而是那些犯了錯誤而不很嚴重，並善於敏捷而迅速地糾正錯誤的人。

費力克斯·特捷仁斯基說：

『會失去聲望的只是那種隱蔽自己的缺點，不願意同醜惡鬥爭的人，也就是那種本應失去聲望的人。必須學會正視真理，並從羣衆及一切參加生產的人們那裏去把握真理。再沒有什麼比自吹自擂與自滿更壞的了，只有當你一步一步地搜索醜惡並征服它的時候，你才能夠前進。』

批評與自我批評，乃是在精神上教育幹部忠誠與老實的最重要的方法。用平常的格言「家醜不可外揚」來進行領導，是不可能的。

在黨選擇幹部的原則遭受破壞的地方，是最容易發生這種類似的非布爾什維克的風習。誰接受了錯誤的選擇幹部的方法，誰就替那些領導集團造成有利條件，便於他們以親密的小宗派、行幫（其成員盡力和平共居而不相互批評）來代替負責的工作人員。在這種土壤上，就繁殖着庸俗的劣根性，而有時就產生對國家利益的不誠實態度。

批評與自我批評，可以使缺點適時的揭露出來。錯誤如不隨時予以糾正，即會滋生新的錯誤，並最後毀滅工作人員。下面就是一個可作教訓的例子：

安得列夫同志最近四年間在薩拉托夫城市蘇維埃執委會擔任第一副主席，還在他擔任這一工作的開始，他就犯了一系列嚴重的錯誤。黨的市委會與州委會接到了很多對安得列夫同志行爲的控訴，但是，他們並沒有及時向他指出錯誤。他自高自大而且自詡爲沒有錯誤的。安得列夫濫用職權，蔑視蘇維埃其他委員的權力，擅自取消區蘇維埃的決定，並脫離羣衆。在一次州委會的集會上他聲明說：『我有很多比接見勞動者更嚴重的事情，我沒有時間傾聽控訴。』

雖然，這一切對於安得列夫都是可以避免的，他却終於被撤職了。如果人們及時的向安得列夫同志指出他的錯誤，而不是由於朋友的關係掩蓋了這些錯誤，那麼可能還會作爲一個工作人員而被保留。

憐惜「幹部的自尊心」，認爲這對於他們就是做了有益的事，是不對的。沒有比這種觀點更錯誤的了！以掩蓋幹部的錯誤來憐惜和保存幹部，等於實實在在地毀滅這些幹部。勇敢的、澈底的和客觀的批評——這是教育幹部的基本方法。這種批評會幫助成全幹部，刺激前進，克服困難。

基洛夫說：

『我們的布爾什維克的實踐，從來沒有過於平穩的關係。我們是會激怒人的，……我們中間，誰要是以這種或那種考慮，認爲：算了吧！說了不好，我還是最好不說，不去批評，那誰就要成爲罪人。應該老老實實地，按照布爾什

維克的方法，直視同志的、共產黨員的眼睛，向他說：「你，親愛的人，你被絆倒了，纏住了，如果你自己不能起來，我就來幫助你。如果拉着手也不能拉起你，我就來拉你的頭髮，我要盡一切可能糾正你。但如果你，親愛的人，不糾正過來，那麼你就責罵你自己吧，你得滾到旁邊去。」

以忠誠的精神教育工作人員，沒有日常的嚴格的監督，沒有執行的檢查，是不可能的。黨的組織同工作人員的關係，不能建立在盲目的信任上。黨的領導和監督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認出工作中的缺點，很快地提出方法糾正它。沒有執行完善而熟練地加以組織的檢查，就不可能保證適時地揭發缺點，並以忠誠與老實的精神，以布爾什維克對所負任務之責任心的精神教育工作人員。如果工作人員知道監督是實實在在的，誰也不能將破壞指示的事馬虎混過，而不爲人所知——那麼僅此即足以使他緊張起來。

爲了勝利地完成戰後五年計劃的任務，黨的組織在工作上就更嚴格，就更要培養工作人員那種對國家對人民的崇高的責任感。對於一個布爾什維克，國家的、全民族的利益是高於一切的。布爾什維克的天職，就是隨時隨地小心地保護自己的榮譽與美德，因爲這是列寧斯大林的偉大政黨的榮譽與美德，在全體蘇維埃人民的眼中，一個黨員應該在一切事情上是先進的人，其德性引起普遍的崇敬與倣倣之心的人。

（譯自四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真理報）

論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

藍列波巨作
亞天貳譯

列寧和斯大林教導我們說，原則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我們的黨不能容忍有絲毫的不堅定性與無原則性的表現。要求我們工作人員能經常不打折扣的完成自己的任務；經常站在政治活動家的崗位。

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就是對一切稍微脫離黨的原則思想和政策的傾向之不可調和的精神。黨的政策是蘇維埃制度之生命的源泉。黨的工作者，在自己一切大小工作中應以黨的政策為行動指南，從政治的原則性的路線出發。

列寧教導我們說，政治是從聯繫到千百萬人民利益的事情出發；是原則地從政治上去對待問題。就是說，要從千百萬人及他們之間相互關係的觀點來觀察問題。這就不能在本位主義的地方性的朋友關係等利益面前作絲毫的讓步。布爾什維克重視友情、同志關係。但是，他認為評定一個人行為的最高標準，是看這個人如何對待由蘇維埃國家所代表的人民利益。

列寧寫道：「我們承認同志間的義務，承認有援助一切同志的義務，承認有耐

心聽取同志意見的義務；但對我們來說，同志間的義務是從對俄國的、和世界社會民主黨的義務產生出來的，不能把它顛倒過來。」（列寧全集二卷五四一—一五四二頁）

由此可見，在原則性的精神上教育幹部，這就是說，必須作到在決定任何問題時，幹部不是從私人的或地方的利益出發，而是從國家的利益出發。在一切場合堅持這種利益，並與反國家的傾向作鬥爭。每個工作人員底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表現在他對自己所擔負的工作之態度上，而檢查他的原則性，就看他是否把自己的工作服從於國家當地的重大政治任務。評定一切措施的標準是：這些措施是鞏固還是削弱我們的偉大事業；促進這件偉大事業的繼續發展，還是妨礙其發展。這一點也應作為測量一切工作人員之布爾什維克原則性的標準。

現實在證明着不善於正確判斷各種現象，和不善於有原則地對待問題，會受到嚴重的損失。拿『星』及『列寧格勒』兩雜誌編輯部所犯的錯誤為例來說——這些錯誤被聯共中央及時地揭發了。這些雜誌的實質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領導工作人員，不是把正確的教導蘇聯人民、和政治上指導文學工作者的活動的利益，作為對待文學工作者的關係之依據；而是以私人朋友的——就是說庸俗的利益，為其對待文學工作者的關係之依據。由於他們不願意破壞朋友的關係，所以他們對沒有價值的、反藝術的、脫離政治的作品不作批評；

由於他們害怕得罪朋友，便登載了非常不適當的作品。聯共中央的決議裡說道：『這種自由主義，把人民的與國家的利益，正確的教育我們青年的利益，作了朋友關係的犧牲品；它閉塞了批評，結果是作家們停止繼續深造，喪失他們對人民對國家與對黨的責任感。他們也就停止前進了！』或者我們再拿對外國阿諛逢迎的事實來看一看。很顯然，我們一部分落後的知識分子，還是沒有擺脫掉這個可恥的毛病。一些黨的和經濟的領導者們，不用蘇聯民族自豪的精神來教育人們，却對媚外的奴顏婢膝事實謀妥協，這還不是無原則性的表現嗎？這說明需要在一切問題上表現原則性，在黨的工作中，尤其必要從政治上處理問題的態度——是黨的工作中的基本態度。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黨的生活與黨的工作之基礎，不在於黨在當時所採取的、或能够採用的那一些組織形式，而在於黨的政策與黨的對內和對外的政策』。（列寧斯大林論黨的建設二卷四一九頁）這就是說我們的工作人員，應當不僅是好的組織者，熟練的實際工作者，而且也是政治上成熟、思想上堅定的人。

深刻的思想，對馬列主義偉大思想之正確性的堅定的信念，便是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之基礎。只有在原則上堅定不移，很好的掌握了馬列主義思想的人，才能具有戰鬥的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才能從黨的原則立場上去對待問題。

馬列主義的理論，給予幹部以光明的前途，使他們在工作中具有信心。這種理論發展他們的才能，使其能從小的事情，看到大的事情；能從日常的眼前的工作

中，感覺到是在爲了偉大的理想而鬥爭；反之對理論上不關心的態度，便會使其失掉前途。論到不關心理論的人們時，斯大林同志說過：他們有從政治活動家，變成爲政治上的庸人，變成無原則的脫離政治的事務主義者。

斯大林同志說：「關於這種游離不定的人們，偉大的俄國作家果戈里曾頗中肯地講過：『那些沒有定見的人物，是既非此又非彼，反正你不能理解他們是些什麼人，簡直是非驢非馬。』」（列寧、斯大林論黨的建設二卷六九〇頁）。

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乃是在思想上、原則性上教育我們幹部的方法，同時也是提高他們戰鬥力的最重要的方法。偉大馬列主義的思想，乃是我們幹部精神力量之活的源泉，是幹部之堅決性及其在克服困難中之不枯竭的精力之活的源泉。實際的經驗在在都證明着思想開展的人們，在實踐中也是有力量的，他們在工作中有更大的信心，暫時的失利不能使他們灰心，他們堅強地向既定的目標前進。正因爲如此，黨便要求我們的幹部有系統的努力地進行自我學習，以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

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是一種對一切缺點的不能容忍性，它是在高度嚴肅性的情況中養成的。關於以原則性的精神教育幹部，儘管高談闊論，但如果黨的委員會不表現足夠的嚴肅性，姑息地對待工作人員的錯誤，那麼便會給布爾什維克的幹部教育，招致嚴重的危害。比如在伏羅希洛夫格勒省黨委中就存在着這種實際情況，

不久以前國家計劃局的代表，揭發了「克拉斯諾鑛煤礦」托拉斯和「卡堂也夫煤礦」托拉斯兩企業中多報礦井中採煤量的事實，他將這些通知了聯共省黨委的領導同志，據估計將會加以處理。但省黨委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原則性，沒有注意兩企業中領導者違反國家利益的行動，沒有使他們受到處分。

作一個有原則性的人，就是說不怕得罪任何人，而直爽地誠懇地指出他們的缺點，領導者應當善於『用布爾什維克所固有的那種全部直爽態度發表自己的意見：……』，『像布爾什維克那樣明白而公開……』（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問題十一版三九八頁一四四頁）。同時有原則性的人，他本身也不怕勇敢的坦白的客觀的批評。

批評乃是布爾什維克幹部教育方法的靈魂，在對批評的態度上，也可以檢驗一個工作人員底原則性，一個工作人員不能把布爾什維克的有益的批評，看作是對自己的侮辱，看作是對自己的威信的損害，因而把自尊心看得高於工作均利益，也應當有勇氣批評別人，也善於勇敢地接受批評。

『任何一個組織，沒有批評的話，都會腐朽的，沒有批評則任何毛病可以深入膏肓，較難治療。只有大膽的公開的批評，才能幫助人們變得日益完善，才能促起人們前進，克服工作中的缺點。凡是沒有批評的地方，那裡便從根上腐爛發霉，停止不前，那裏便沒有可能前進。』（日丹諾夫）

可惜還有一些工作人員，對批評的不能容忍態度，竟以報復所謂「欺侮者」相威脅，而有時竟然實際的威脅起來了。可舉這樣一件事實為例：黨員伊萬年科同志，曾同其他一些同志正確批評了莫斯科——庫爾斯克鐵路配車處的工作中的一些嚴重的缺點和該處處長斯米爾諾夫同志，斯米爾諾夫不去傾聽批評與按照布爾什維克的精神改正工作中的嚴正缺點，反而把伊萬年科同志的工作撤掉了，甚至當伊萬年科奉部令恢復了工作之後，斯米爾諾夫却硬降低了他的工作職位，按他的專門技能，本是工程師，現在却要他當統計員。奇怪的是鐵路局黨組織的領導者們，對此熟視無覩，事實上是助長了斯米爾諾夫同志的不正確的行動。

不能容許這樣一種用處理家務事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的情況之存在，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解決問題，妨礙對缺點的揭露與糾正，對教育作為政治活動家的工作人員是有危害的。

缺乏原則性，沒有布爾什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有時會得到什麼結果呢？在庫爾罕省黨委的實例中，可以看得很明顯：該省黨委的前任書記沙拉波夫同志，以朋友關係代替了工作中的黨的原則性，省黨委中形成了一種一團和氣、泰然自若的風氣，黨的與蘇維埃的積極分子中間，出現了無紀律性與放蕩散漫的分子。沙拉波夫同志自己不關心工作，竟有這樣的情形：當農村工作火熱的時候，他却去找自己的朋友和熟人遊逛去了！這樣得到了什麼結果呢？結果是該省許多區裏播種進行

得不好，收割與交納糧食的工作也準備得很不好，省黨委的委員們都知道這一切情形，但對省黨委領導者所養成的這種非布爾什維克的習性，不進行反對，這樣便表明了他們是無原則性的人，是庸人而非政治的活力家。

無原則性的工作人員，其結果往往是失掉獨立性與自動性，追求物質享受的工作者，把自己束縛起來，失掉了批評別人的可能性。庫爾罕省黨委的委員們，在對省委有許多的關係上，表現了無原則性，就因為他們中間有一些人按照沙拉波夫同志的提議幾度獲得了獎金，這也是他們彼此互相原諒錯誤的原因之一。

無原則性、庸俗化也常常是不遵守布爾什維克原則挑選與分配幹部的結果。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要根據政治的標準來挑選幹部——就是說：要看該工作人員在政治上是否是可靠的，也要根據業務的標準——就是說：看他是否適於這樣一種具體工作。凡是違反這些原則的地方，凡是挑選幹部只根據家庭的、庸俗的、朋友的關係，不管他們政治上和業務上是否適宜，那裡便要替吹拍逢迎與在工作中互相包庇缺點造成有利的條件，得到的不是在原則基礎上的領導核心，『不是負責的領導集團，而是親近人們的小家庭，而是這樣一種組合，它的組員都力求和平共居，彼此不相得罪，家醜不可外揚，互相吹噓……』（斯大林）。

在這種情況下，根本談不到對工作人員的高度嚴肅性。在烏梁諾夫斯克有很多事實表現出了嚴重的缺點，比如城市管理無人過問，居民們常常沒燈光，自來水忽

有忽無，滿街是髒東西，省委書記德林吉也夫同志對此熟視無視，對於城市管理失職的罪人，表現了自由主義的態度，這一切正因為德林吉也夫從前曾在遠東工作。當時，他便隨身把幾個對於他是「合適」的工作人員，帶到烏梁諾夫斯克來，現在他對於這些人的工作，也未表現出足夠的客觀態度，而因朋友關係，對他們就百無地原諒了！

對幹部進行思想教育，這是我們當前的重大任務，新的幹部不斷的增長起來，必須以布爾什維克的傳統教育他們，發展其優良的性格與品質，高度的原則性與理論性，乃是列寧——斯大林式的工作人員之卓越的特點與最重要的品質，以原則性與克服困難的堅決性教育幹部，將會促進更加順利的實現新五年計劃的任務，與在我們國家內建設共產主義的任務。（譯自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真理報）